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构建^{*}

肖希明 沈 玲

摘 要 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本土化探索经历了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和改革开放至今三个时期,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以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的成果最为丰硕。但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特有的文化渊源、现实国情、话语体系和方法构建四个方面,核心理念主要体现为四个意识:问题意识、范式意识、方法意识和视野意识。以此为依据,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应该由四个部分组成:图书馆学元理论、图书馆发展理论、图书馆治理理论和图书馆职业理论。这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体系,随着社会发展和事业进步而不断创新。图 1。参考文献 55。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 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 历史发展 当代构建

分类号 G250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AO Ximing & SHEN Ling

ABSTRACT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first 30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riod starting from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prese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to a varying extent during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y were particularly fruitful over the past 40 years. In spite of this, it remains an arduous task to build a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1) its cultural origin i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ncient Chinese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图书情报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9VXK09)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special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No. 19VXK09) which is one of the project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沈玲,Email:shenling@whu.edu.cn,ORCID:0000-0002-8911-9192(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SHEN Ling,Email:shenling@whu.edu.cn,ORCID:0000-0002-8911-9192)

library science thoughts; 2) its value orientation is embodied in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based on China's actual national conditions; 3) its form of expression is a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4) its method system is oriented to researching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1) problem awareness, i. 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amework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actical problems emer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science; 2) paradigm awareness, i. e. extracting the basic concepts, basic categories and core propositions of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methodological awareness, i. e. keeping absorb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to improve research ability and standardization; 4) vision awareness, i. e. developing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actively absorbing and learning from foreign advanced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 framework of fundament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composed of four parts: library science meta-theory, library development theory, library governance theory, and library professional theory. Among them, library science meta-theory plays a fundamental and dominant role, and the rest three are the exte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meta-theory. This is an open system that keeps up with the time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many new theories will be incorporated into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hence enabling this framework t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leading and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ibrarianship. 1 fig. 55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Fundamental theo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从宏观方面阐述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从而揭示其本质和规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图书馆学各分支学科的共同基础,具有基础性和指导性作用,同时它又横贯、联系并渗透在各分支学科之中,具有横断学科的性质与作用^[1]。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伴随西学东渐的深入,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从西方(包括早于中国接受“西学”的日本)传入中国,应属“舶来品”之列。与其他任何外来文化一样,图书馆学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都必须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对此,中国学术界的先贤们是有清醒认识的。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的演说中提出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2],为中国的图书馆学人留下

了一个“世纪课题”。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图书馆人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当然也包括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然而,这条探索道路走得十分曲折和艰辛。究其原因,首先是图书馆学理论赖以扎根和生存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土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过于贫瘠,同时外部环境的大风大雨也影响了它的生长;其次在于图书馆人的认识水平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因此,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包括中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至今仍然是一个尚待完成的课题。

历史进入到今天,经过 40 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从整体上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不仅大大缩小了与世界的差距,而且在很多方面达到

甚至领先世界水平。在理论研究领域,中国图书馆人生产和积累了大量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已经在用自己创造的概念和理论范畴及自己的话语表达方式,生动地讲述和诠释图书馆领域的“中国故事”。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条件已经具备。

本文简要梳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本土化探索的历程,分析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特质,探讨其核心思想,尝试构建一个基础理论框架,并探索基础理论体系建设的路径。

1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探索历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与学术思想不断输入中国,“图书馆学”也漂洋过海在中国着陆。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的创办和图书馆学课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诞生。自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便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进程相伴而行,经历了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和改革开放至今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进行了本土化亦即中国特色的探索,且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1.1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初创(1909—1949)

1909年,晚清秀才孙毓修写成《图书馆》一书,在《教育杂志》上连载,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图书馆学著述。《图书馆》并非翻译之作,而是孙毓修“仿密士藏书之约、庆增纪要之篇,参以日本文部之成书、美国联邦图书之报告,而成此书”^[3]。孙氏“较为充分地使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以解决中国图书馆的问题”^[4],堪称本土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最早尝试。

随着文华大学图书科的建立,一批本土化的图书馆学教程、教材、期刊和论文相继问世,

构成了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这一时期,一大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述涌现。如1922年杜定友发表《图书馆与平民教育》《图书馆与教育》等论文,以及《图书馆通论》(1925)、《图书馆学讲义》(1925)、《图书目录学》(1926)、《图书馆学概论》(1927)等一系列著作,形成一股“杜著”旋风。1923年杨昭愬《图书馆学》一书出版;1926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创办《图书馆学季刊》,刘国钧任主编;1926年洪有丰的著作《图书馆组织与管理》、1934年刘国钧的著作《图书馆学要旨》等问世。这些著作所介绍和论述的都是关于图书馆的性质、宗旨、意义和功能,以及图书馆学的概念、内容和学科价值等基础理论的内容,其目的正如《图书馆学季刊》中所宣称的旨在探索“如何应用公共之原则,斟酌损益,求美求便,成一‘中国图书馆学’之系统,使全体图书馆学之价值缘而增重”^[5]。

这一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探索的成果,体现了对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研究。杨昭愬在《图书馆学》中将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分为“纯正的”(关于原理原则)和“应用的”(关于方法技术)两大类^[6]。杜定友在《图书馆通论》中提出更加完善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将图书馆学分为“专门的”和“辅助的”两个分支,又将“专门的”分为理论和实用两部分。1935年李景新发文将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分为“历史的”和“系统的”两类,“系统的”图书馆学又分为“理论图书馆学”与“实际图书馆学”两部分^[7]。这些都是探索本土化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尝试。

20世纪20、30年代,世界图书馆学理论领域产生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巴特勒等人的“社会说”、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中国图书馆学也致力于构建本土流派的图书馆学说,其中的突出成果当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要素说”的提出。1921年刘国钧最早提出“合法的、设备、适宜的管理员、正当的书籍”三要素^[8],同年戴志嘉提出“设置地点、建筑、采购、分编、开放时间和图书公开”六要素^[9],1925年梁启超提出“读者和读物”两

要素^[2],1929年陶述提出“书籍、馆员、读者”三要素^[10],1932年杜定友提出“书、人、法”三要素^[11],1934年刘国钧将三要素完善为“图书、人员、设备和方法”四要素^[12]。“要素说”吸收了东西方古代哲学中关于世界万物起源和存在多样性的思想,采用了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理论中“将整体分为各个部分加以研究,以及从各个部分的研究中再合成一个研究对象的整体”^[13]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局限,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家没能使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摆脱“描述图书馆活动”的局限^[14]。

1.2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曲折发展(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得到极大改善。1949—1956年间,图书馆事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基础。不过,由于这一时期无论是图书馆事业的决策层还是图书馆人,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图书馆实务领域的发展,加上当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没能很快适应学术研究环境的变化,因此这七年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相当沉寂,几乎没有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同年,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等院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人民日报》发表了《向科学进军中的图书馆工作》的社论。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开始复苏。作为这种复苏的“风向标”和“历史转折关口指路牌”^[15]的是刘国钧发表的论文《什么是图书馆学》(1957)。一直以来,学界很多人都将《什么是图书馆学》视为主张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要素说”的代表作,或褒或贬,其实是对这篇文章的误读。刘国钧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规律及其各个组成要素性质和规律的科学。”他还说“研

究图书馆在人类历史的作用,研究它的发展过程,分析它的要素,掌握它们的规律,从而使它能更好地为生活服务,是图书馆学的第一个课题”^[16]。显然,刘国钧此时已认为图书馆学要研究的是宏观的图书馆事业,而且是它的“性质和规律”,“要素”只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一个维度。因此,刘国钧研究的正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核心问题,而且这可看作是基础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此外,刘国钧此时将“图书馆事业”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具有特别的意义。1956年,国家将图书馆事业纳入“向科学进军”的发展战略中,刘国钧的文章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角度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这正是我们今天极力倡导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要立足国情,以问题为导向的价值取向。

20世纪6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突出成果是黄宗忠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矛盾论”的提出。1962年,黄宗忠运用毛泽东《矛盾论》中的哲学思想分析图书馆特有的矛盾,认为图书馆的“藏与用”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构成了图书馆的特殊矛盾,要通过研究图书馆的特殊矛盾来探索图书馆的本质和规律^[17]。它的理论贡献在于从哲学角度出发探讨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从现象描述发展到科学抽象阶段,堪称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具有原创性和本土化的研究成果。

1966—1976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的图书馆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图书馆学研究也随之中断。虽然1972年以后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教育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恢复,但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除了图书馆学教育机构自编的教材和讲义中有一些政治口号式的“理论”外,没有其他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1.3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探索中逐渐成型(1978年至今)

1978年底,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

程。图书馆事业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空前活跃,对外开放带来了大量的国外图书馆学著作、思想和理论,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各省图书馆学会的成立使图书馆学研究成为有组织的学术活动,《图书馆学通讯》(现《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复刊和一大批图书馆学期刊的创刊使图书馆学研究成果有了发表和争鸣的园地。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1)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反思和争鸣中不断发展(1978—1999)

改革开放伊始,一大批“新中国17年”培养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正值学术盛年,他们在被压抑10年后,学术激情喷发。更有一批恢复高考以后进入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的青年学子,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中外各种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理念和方法。他们都不满意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现状,认为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局限于图书馆工作流程和图书馆活动的经验描述,是图书馆学难以被承认为一门科学的真正原因,由此形成了对经验图书馆学的批判。这一波批判以80年代前半期彭修义的《关于开展“知识学”研究的建议》、邱昶和黄昕的《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沈继武和刘迅的《论我国图书馆学的危机及其革命》、张晓林的《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等为代表作,这波反思与批判大大推动了图书馆学科学化的进程。80年代后半期,一批知名学者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以专著或教材的形式问世,如吴慰慈和邵巍的《图书馆学概论》、周文骏的《文献交流引论》、倪波和荀昌荣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黄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宓浩的《图书馆学原理》等。这些著作和教材基本摆脱了经验图书馆学的范式,致力于构建一个以现代科学精神为导向、具有本土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如宓浩的《图书馆学原理》以“知识交流论”为框架构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让人

耳目一新;黄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以哲学思维审视图书馆发展规律,以“矛盾论”为核心构筑新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受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影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经历过一段时期的“迷茫”^[18],转机出现是在1996年北京举办第62届IFLA大会前后。这届大会的主题是“变革的挑战:图书馆与经济发展”,它给中国图书馆学界带来了思考: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不仅要告别经验图书馆学范式,而且要摆脱以完善学科自身体系为导向的纯理性思辨研究的束缚,转向关注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寻找“中国答案”。代表这种思考的是吴建中与13位国内外图书馆领域知名学者的“关于图书馆未来的对话”,这组对话表明中国的图书馆学家一方面以宏阔的视野关注着国际图书馆学的前沿,同时也在思考着中国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构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目标在图书馆学家的心目中愈益明晰。

(2)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逐渐成型(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酝酿于90年代后期的研究观念变革由范并思的《变革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任务》(2000)一文拉开序幕。范并思认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非常依赖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图书馆事业正在发生着的变革全方位影响到图书馆学”。因此他提出变革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任务是“发现与倡导新的观念,推动图书馆事业变革的进行”,“研究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总结变革中出现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构造新的框架,为新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19]。他虽没有使用“中国特色”这个概念,但他提到的研究任务无一不是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的着力点。紧接着,李国新发表的《对“图书馆自由”的理论思考》^[20](2002)引发了对“图书馆权利”的讨论,涉及的是“公众自由利用图书馆是一种‘权利’”

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与此同时,程焕文、范并思、于良芝、蒋永福等学者对图书馆精神、图书馆制度、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总分馆制,以及对普遍均等惠及全民、信息公平、免费服务等现代图书馆理念的研究,对阅读推广理论体系的研究等,引发了图书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些研究和讨论,既接轨国际上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与理念,也立足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情况,为国家制定和完善图书馆事业政策乃至公共文化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体现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能力,彰显了新时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中国特色。

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进入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这一百年也是中国图书馆人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不懈探索的一百年。相比图书馆学的众多应用领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本土化建设似乎更为艰难曲折。近20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式从“学科本位”转向“问题本位”,取得了许多颇具中国特色的重要理论成果。但如何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将众多新的理论成果纳入到这个理论体系之中,使这个理论体系对现实中的图书馆事业真正起到引领、支撑作用,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2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与构建理念

2.1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

不可否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许多涉及学科本原的概念、理论是没有国别、民族特性的。但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既要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及图书馆学应用实践领域的问题,就不可能没有国家和民族的色彩,因为“事业”和“问题”都是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与国情紧密相关的。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应该具有以下四方面的基本特征。

(1) 文化渊源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应该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人本”“民本”的思想,如记载着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子思想观点的《管子·霸言》中有“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21]之说,《尚书》中也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2]。这说明人本、民本思想并不是西方的特产,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也是当今图书馆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办馆理念的渊源。发轫于周代,经孔孟及历代儒家传承和发展的社会教化理论,“在塑造民族性格、提升民众德性素养、促进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23],今天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阅读推广功能,莫不滥觞于此。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向来有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传统,主张多元文化融合发展,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应该继承这种优良的学术传统,善于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传自西方,但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思想,以及目录学、校雠学、文献学、版本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渊源。如程俱关于“馆阁”即图书馆“资政”和“育人”功能的论述,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包含的“治书”与“治学”关系的思想^[24],从“文以载道”衍生的“藏书以传道”中所蕴含的图书馆价值理性^[25]等,都是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应该汲取的精神养分。

(2) 现实国情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要扎根中国大地,立足现实国情,体现问题导向。中国的现实国情是什么呢?首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括物质生活方面,也包括精神、文化生活方面,而我国的公共文化事业、图书馆事业中存在的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相当突出。事

业发展的需求应当成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创新的最强驱动力,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要为解决我国图书馆事业、公共文化事业中的现实问题和矛盾提供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其次,我国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在这个远景目标中,科技强国、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书香中国、数字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等都是与图书馆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发展战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要为图书馆学应用实践领域服务于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和社会的重大需求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第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也要研究国家的图书馆制度问题,因此必须与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以现行的国家法律制度和政策为根本遵循。

(3) 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任何学科的理论或学术思想以及学科的概念和范畴、理念和方法等,都需要借助一定的话语形式来表达,这样的一套“话语主体之间进行思想表达和交流的要素组合”^[26]就是话语体系。话语体系衍生出话语权,话语权则关系着学科的影响力和学科地位。因此,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要着力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话语的灵魂是思想,没有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的有效供给,就没有话语体系的构建。因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新的理论命题、新的理论判断。近年来,从“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到“图书馆权利”“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核心价值”“公共图书馆是保障信息公平的制度安排”“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等,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话语。

(4) 方法体系

研究方法从不同的维度可做不同的划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既有普适性,同

时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又有各自的功能,体现出各自的特色。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早期主要采用理性思辨法、案例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定性分析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调查研究法、统计分析法、数理方法、引文分析法等定量研究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也日益增多。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有模型展示法、数据挖掘法、仿真研究法,以及评价研究法、计量分析法、关联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的加入。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应努力构建本学科的方法论体系,这个方法论体系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吸收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优点,同时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问题。

2.2 构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核心理念

(1) 问题意识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应根植于中国本土,面向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各种新问题与新情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任何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的提出,都应该是基于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从概念中推演出来的“虚”问题,更不是闭门造车、冥思苦想出来的“假”问题。中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有广阔、深厚的实践基础,也有其独特的现实问题,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目标不是追求海市蜃楼般远离现实的“学理体系”,而要成为用科学理论去解释和解决图书馆事业中现实问题和各个层面矛盾的“钥匙”。

(2) 范式意识

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所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他认为范式是科学家群体对共同关注的某领域问题和理论本质持有的信念或观点,并将其划分为符号概括、范例、模型和价值四种成分^[27]。研究范式往往会外化为一套概念与范畴体系。因此,构建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要强化范式意识,具体而言:一是要凝练出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稳定性、能够反映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和实践的基本特性和逻辑起点的基本概念;二是要确定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基本范畴,这些范畴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征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符合当前社会的现实需要和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三是通过总结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图书馆实践的需求,研判国内外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趋势,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命题。

(3) 方法意识

任何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必须借助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促进学科不断发展。传统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如理性思辨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下,跨学科、跨领域的问题不断出现,局限于传统的研究方法显然难以解决现实中的复杂问题,难以满足图书馆实践对理论的要求。因此,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不断吸收借鉴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提高科学研究的能力和规范性,进而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必须指出的是,方法意识决不是为方法而方法,更不能为了应用某种研究方法去套用问题。

(4) 视野意识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任何国家与民族创造出来的先进的优秀的图书馆学知识都值得吸收和借鉴。习近平同志说:“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28]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要具有国际视野,面向世界,积极吸纳与借鉴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先进的理论与方法;要虚怀若谷,与国外图书馆学界开展学术对话,互

学互鉴,这样才有利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走出去,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吸纳西方图书馆学优点,决不能全盘照搬。对西方图书馆学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对其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内容,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认识,不能盲目追随。

3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当代构建

“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提法始见于1988年黄宗忠编著的《图书馆学导论》,在该书中作者构建了一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1]3}。2006年,黄宗忠又修订和完善了这个体系^[29]。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20余年中,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的成果很多,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已摆脱经验图书馆学的模式,转而关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问题,然而这种“学科范式”的理论体系要体现出“中国特色”并不容易。2007年,力主转变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式,重构新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范并思,构建了一个以现代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的基本理念为主线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30],这是一个突破了“学科范式”而以“观念范式”构想的新的理论体系。但随着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应用领域实践的不断丰富,同时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新概念、新范畴和新的理论命题,这就需要创新理论体系以涵盖今天生动丰富的应用实践内容,并为当今图书馆事业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中国答案”。因此,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依然是今天面临的重要课题。

根据上文论及的基本特征和构建理念,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应该由四个部分组成(见图1):图书馆学元理论、图书馆发展理论、图书馆治理理论和图书馆职业理论。其中,图书馆学元理论起到基础性和支配性作用;图书馆发展理论、图书馆治理理论和图书馆职业理论是图书馆学元理论的延伸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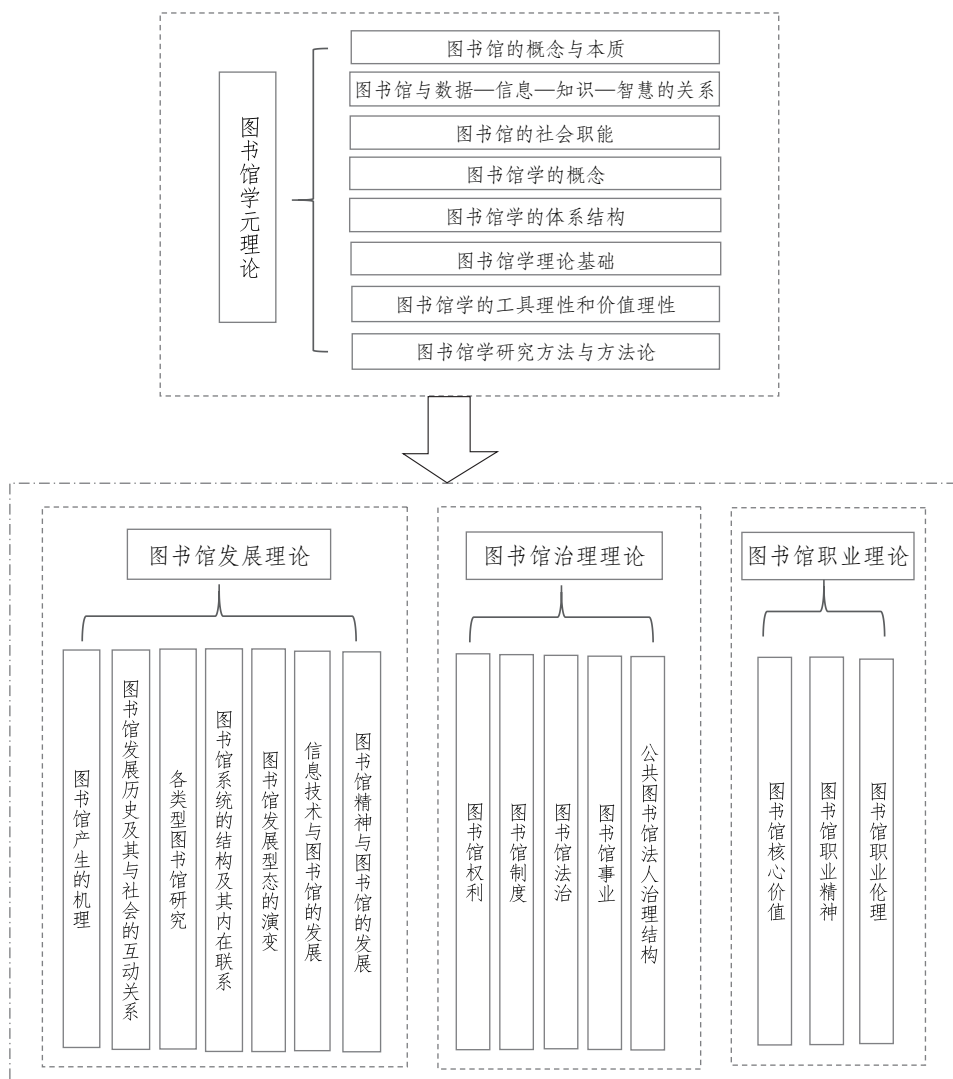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结构

3.1 图书馆学元理论

元理论(Meta-theory)是哲学社会科学中经常涉及的概念,是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元理论是源于人类企望理解并不断追求理解的本性而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现象和知识形式”,其任务是“考察对象理论的论证结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构成方式、定义和证明方法,分析和揭示理论论证所依赖的各种前提”^[31]。图书馆学元理论就是对

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概念及其内涵和构成、基本研究范围、基本现象的原理性描述方式和方方法论等进行的研究,它是在更根本、更深入的层次上对图书馆学理论逻辑进行的阐释和说明,也是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基点。图书馆学元理论本身也是一个体系,大体上由以下八个方面构成。

(1) 图书馆的概念与本质

概念是思维的一种基本形式,反映客观事

物一般的、本质的特征。长期以来,人们接受了将图书馆定义为“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并向读者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32]。然而在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中,图书馆一定得是这样一个“机构”吗?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可以是一个“社会机构”,也可以是一种“服务”^[33];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是一个“物理场所或信息空间或虚实结合的复合体”^[34];有的认为应该将图书馆看作是一种“社会记忆的外存和选择传递机制”^{[11]58}。那么,图书馆应不应该有一个恒久的定义,图书馆的定义能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能不能找到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图书馆定义,很显然,这些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应该讨论的问题。

探索研究对象的本质,是科学研究的使命。20世纪80—90年代,对图书馆本质的探寻曾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21世纪初又出现了一批消解性的观点,因此形成了“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争论。“本质主义”主张追问图书馆本质,认为任何事物所表现的特征都是由其内在本质决定的,所以“只要发现这种本质,就可以完全把握和驾驭该事物的发展规律”^[35],图书馆亦然。“反本质主义”则认为人们寻求的图书馆“本质”,其实就是人的主观建构的产物,并非图书馆本身固有的东西,主张摒弃本质、解构本质、不再追问本质,否定图书馆本质的研究意义^[36]。那么图书馆的本质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构的,追问图书馆的本质的意义何在,如果图书馆的本质是存在的,那么图书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些也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需要探讨的问题。

(2) 图书馆与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关系

这是一个与图书馆概念有关的问题。传统图书馆主要以文献为工作对象,现代图书馆工作则更注重对文献中所包含的信息和知识内容的组织、管理和传播利用。图书馆学被认为是与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密切相关的学科。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海量的数据进入社

会生产生活各领域,同时也成为图书馆资源体系的组成部分,数据管理成为图书馆业务领域必须关注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物联网等智能感知技术在图书馆的运用,“智慧图书馆”的概念被提出,“智慧”也与图书馆产生了关联。那么,数据、信息、知识、智慧之间以及它们与图书馆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有研究认为,数据—信息—知识—智慧是一个递进转化的过程^[37]。这一发展过程对图书馆产生的影响是值得探讨的。

(3) 图书馆的社会职能

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实际上就是社会要求图书馆发挥怎样的作用。既然是社会赋予的功能,当然就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具有密切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图书馆可能会扩大或强化某些职能,也可能会弱化甚至消除某些职能,各项职能的重要程度也可能会有变化。

1975年国际图联提出图书馆有四大职能: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和开发智力资源。2008年吴慰慈在《图书馆学概论》中提出图书馆的五大职能:社会文献信息流整序、传递文献信息、开发智力资源与进行社会教育、搜集和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满足社会成员文化欣赏、娱乐^{[11]82-90}。职能的范围和次序都发生了变化。近年来,图书馆界一直讨论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职能,并将这种理念付诸实践。2018年,芬兰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建成开放,这是一个“聚会、阅读和多样化城市体验的场所,为读者提供知识、新技能和故事,是一个获取知识、体验故事和工作及休闲的惬意空间,一个向所有的人敞开大门的灵动而功能常新的新时代图书馆”^[38]。它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新时代公共图书馆社会职能的重新思考和讨论: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有哪些“变”与“不变”,新时代中国特色图书馆应该具有哪些社会职能。

(4) 图书馆学的概念

1807年施莱廷格提出“图书馆学”这一概

念,二百余年间人们对图书馆学的定义从关注表象到深入本质机理,从关注一个社会机构到放眼整个社会,同时也关注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给学科带来的影响^[39]。从计算机的发明、信息技术的变革、互联网的普及,到今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一次次的科技进步不仅给图书馆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图书馆学研究。学科从分化走向综合的趋势,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对多学科协同攻关的要求,以及社会对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使图书馆学界不能不思考:图书馆学研究如果不突破图书馆机构的局限,如果不能面向与信息、知识相关的更广阔的实践领域,还有多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应该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科学地定义当代的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的概念要不要“去机构化”。

(5) 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

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一直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民国时期,杨昭愬、杜定友、李景新、俞爽迷等人就研究过图书馆学体系结构问题。虽然1949—1978年间,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研究几近中断,但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对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讨论十分热烈,成果丰富,但也见仁见智。如易凌、龚蛟腾梳理了这40余年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嬗变历程,总结出五种类型的学科体系:“二元”对照型、“三元”鼎足型、“四元”兼顾型、“五元”层次型和“多元”创新型^[40]。目前在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图书馆学体系结构需要研究哪些问题呢?笔者认为,首先,在图书馆学研究的“信息范式”“知识范式”已成为主流,跨学科研究成为发展趋势的环境下,必须思考图书馆学体系结构是否还应该以图书馆或文献为中心来构建;其次,图书馆学学科体系能否“不再拘泥于学科体系的严密性结构”^[40]转而构建一个能不断融入学科领域新概念、新范畴和新理论的较为开放的体系;第三,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如何将中国传统学术精华

与西方先进的科学理论融为一体,也是学科体系构建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6)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提供支撑的哲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虽然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处于图书馆学体系之外,是“相关学科理论在图书馆学的应用”^[29],但这些理论有助于深刻地揭示图书馆现象的本质和客观规律,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提供认识论基础,从而有效地指导图书馆学研究的全过程。因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需要研究这些相关学科的理论在图书馆学之间的应用关系。

由于当今图书馆事业涉及领域与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在“新文科”背景下图书馆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因此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也不可能是单一的学科,而是一个基于多种理论、学说的学科群。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根本理论基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在图书馆学研究和实践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41];同时,还要广泛地吸收和应用其他学科如科学哲学、信息哲学、系统科学、文化哲学,以及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分析和解决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中的问题提供理论与方法的支持。

(7) 图书馆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图书馆学的工具理性主要是指将图书馆纯粹作为工具、手段进行研究,注重技术在图书馆发展中的作用,积极研究如何通过各种先进技术与手段来提高图书馆的工作效率。图书馆学的价值理性则主要表现为追求图书馆终极的价值目标,研究如何在图书馆的现实活动中,用“人的尺度”去引导、把握“物的尺度”,重视用情感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观和人性化的技术

手段来指导和从事图书馆实践活动^[42]。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广泛而成功的应用给图书馆带来了深刻变革,但同时也使人们陷入了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进而出现了图书馆学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迷误。很显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失衡不仅不能促进图书馆的发展,反而会背离了图书馆的“初心”。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应该秉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图书馆活动的目标,在积极研究利用新技术的同时,高扬图书馆学价值理性和人文精神,努力寻求图书馆学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和整合。

(8)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就是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提出新理论、揭示事物规律的工具与手段。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作为对象去进行专门的研究,就是图书馆学方法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而元理论则由于它的基础性和深层次性,往往同哲学联系紧密,因而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是图书馆学元理论应该探讨的问题。国内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受到关注,关于方法论研究的观点,大约有“层次论”“过程论”“实用论”等几类^[43]。进入21世纪以来,为适应新的信息环境,图书馆学研究中开始广泛使用文献计量法、引文分析法等新的研究方法。但“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迄今为止方法论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图书馆学尚未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体系”^{[11]42},而在具有普适性的研究方法中如何融入中国特色,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3.2 图书馆发展理论

近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在我国发展已逾百年,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研究总结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关注和解决当今图书馆事业发展遇到的问题,是图书馆发展理论研究的目标和任务。面对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国内外技术和人文环境的变化,图书馆如何变革与转型,图书馆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是当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必须研究的问题。

(1) 图书馆产生的机理

图书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唯物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44]，“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45]。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图书馆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技术原因,探寻图书馆产生与人类知识交流、文字和文献产生的关系,图书馆产生与社会生产力及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

(2) 图书馆发展历史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中外图书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漫长的古代图书馆时期,19世纪中叶以公共图书馆产生为标志的近代图书馆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计算机应用为标志的现代图书馆时期。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及其构成成分均以总体的体系方式存在,要从研究对象的整体出发,从研究对象内部的相互作用与矛盾和研究对象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研究”^[46]，“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可以塑造与改变社会存在”^[47]。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要探析推动图书馆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什么,不同历史时期的图书馆发展有哪些不同特点,以及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与社会互动,社会如何影响图书馆的发展,图书馆又是怎样反作用于社会。

(3) 各类型图书馆研究

随着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能与服务任务,拥有不同的服务对象,工作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将各式各样的图书馆进行类型的划分和研究,以便把握不同类型图书馆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便于从全国或地域范围内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进行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促进图书馆事业均衡、协调发展。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需要研究图书馆类型的划分标准,不同类型图书馆的性质、作用、特点和任务。在我国,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科学与专业图书馆被称之为图书馆事业的三大支柱,在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三大类型图书馆如何在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等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

(4) 图书馆系统的结构及其内在联系

图书馆系统结构的概念是系统理论运用于图书馆学领域的研究提出来的。系统具有层次性特征,图书馆系统也有宏观与微观之分。宏观层次的图书馆系统以各种类型、不同层级和规模的图书馆为构成要素,微观层次的图书馆系统实际上是图书馆工作系统,是由图书馆一个个工作环节组成的工作流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并不研究图书馆系统内各构成要素的具体运作,而是要运用系统理论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如何使图书馆系统的结构更加合理,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系统的整体和局部之间如何加强联系和协调,图书馆系统的功能如何实现最优化,以及图书馆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如何形成良性互动,等等。

(5) 图书馆发展型态的演变

我国图书馆发展经历了从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再到现代图书馆的转型,而且这种转型远没有结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图书馆从“以书为本”的传统图书馆转向“以服务为本”的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今天,“新一代知识技术将驱动图书馆各个领域更注重多元化、体验化、智慧化,最终实现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向智慧服务与智慧图书馆的转型”^[48]。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要研究图书馆转型的内在驱动力和外驱动力、图书馆转型的目标和实现路径、图书馆转型可能的风险与风险

的规避等。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还要研究如何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贯穿到图书馆转型实践中。

(6) 信息技术与图书馆的发展

技术是图书馆发展最直接的驱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数字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了图书馆业态。近十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兴技术的应用,更是推动了图书馆形态的演变。因此,图书馆学研究对技术的青睐与热情是必然的,它体现了图书馆学应有的科学精神。然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需要以更加理性的思考来关注技术与图书馆的关系,例如:技术应用于图书馆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技术在提高图书馆工作效率的同时如何让用户或公众的信息、知识和文化需求得到更充分的满足,技术怎样才能促进信息资源的公平获取,等等。同时,技术在应用于图书馆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如知识产权、信息安全、信息伦理等法律、制度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其中所包含的理论也需要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提供支撑。

(7) 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的发展

图书馆精神的研究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先进信息技术和设备在图书馆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图书馆的服务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图书馆员的敬业精神没有得到同步提升。这种现象促使人们思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仅仅依靠“物”是不够的,还必须关注“人”——包括用户和馆员,正如美国学者E·G·霍利所言:“我们的职业基础是一种人文职业,我们的目标实质上是人。”^[49]图书馆需要寻找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图书馆精神“成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重要话题,也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50]。同时,图书馆精神中倡导的爱国、敬业,也是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3.3 图书馆治理理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图书馆是国家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图书馆治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图书馆治理与图书馆管理不同。图书馆管理是在图书馆内开展的计划、组织、协调、指挥、控制和监督等活动,以维持图书馆的有效运行,属于应用图书馆学的范畴。图书馆治理则是“建立一个制度体系,科学合理界定图书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职责和利益的关系,从而实现图书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51],属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范畴。图书馆治理理论主要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1) 图书馆权利

保障公民平等利用图书馆的权利,是党的创新理论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图书馆治理重要的价值目标。进入21世纪后,图书馆权利受到图书馆界的高度关注,产出了许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促进了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立。因此,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该涵盖图书馆权利研究,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图书馆权利概念的界定、内涵、形态及内容构成,以及东西方文化对图书馆权利的理解异同及图书馆权利的本土化问题、图书馆权利的法理依据和法律保障机制、图书馆权利的实现途径等。

(2) 图书馆制度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52],图书馆治理的核心也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治理制度体系。蒋永福将图书馆制度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制度安排意义上的图书馆制度,二是职业规范意义上的图书馆制度。前者是就公共图书馆而言的,要求国家及其政府将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保障它的普及和发展,以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保障社会信息公平;后者是指为规范图书馆职业活

动而形成或制定的规则体系,包括图书馆职业准入制度、图书馆职业自律制度、图书馆内务制度等^[53]。当今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要将图书馆制度置于国家治理制度体系这个大背景中加以研究,探讨如何在图书馆治理制度中体现中国特色,这些特色应包括坚持党对图书馆事业的领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提高服务效能为中心和协调合作,共同治理^[51]。

(3) 图书馆法治

图书馆法治是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党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英美等发达国家早在19世纪就制定了图书馆法。在我国,民国时期李小缘也曾提出过制定图书馆法。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界就一直在探讨、研究图书馆法的制定,图书馆立法成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201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颁布,这是我国图书馆法制建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但图书馆法制建设不仅仅是通过一部公共图书馆法,而是要建立一个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图书馆法治更是要强调图书馆事业要依法治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运行机制将法律条文的规定落到实处。因此,图书馆法治应该成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4) 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事业研究一直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图书馆事业研究要根据时代发展和国情特点,探讨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原则、图书馆事业的结构与改革的方向和思路、图书馆事业建设主体的责任、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事业建设的理论与政策支持、各类型图书馆的合作、协调与资源共享、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此外,图书馆事业研究还要密切关注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前沿和趋势,及时总结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探索未来的发展前景。

(5)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单位按照法人治理结构框架组建理事会,吸纳各方代表、社会人士参与管理;2017年通过的公共图书馆法将“推动公共图书馆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列入法律条文。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组成部分,是政府治理图书馆战略思维的重要转型与改革,是保障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法治化制度,其目的就是要完善图书馆治理体系,提高政府对图书馆的现代化治理能力,促进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取得最佳绩效。面对国家的重要战略决策和图书馆的重要改革需求,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作出回应,要研究公益性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理论依据、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国外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模式及主要特点,调研我国公共图书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现实问题与障碍,提出建立和完善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中国方案”。

3.4 图书馆职业理论

现代图书馆注重“以人为本”,这里的“人”不仅包括用户,还应该包括图书馆员。事实上,没有一支敬业乐业的图书馆员队伍,图书馆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图书馆职业理论应该成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图书馆职业理论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图书馆核心价值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行业、一个组织内部,都需要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有一整套广泛认同的观察世界、认识事物的基本标准,图书馆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图书馆界都在研究和确立图书馆的核心价值;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目标。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图书馆界启动了核心价值研究,研究与建立图书馆核心价值就是图书馆界要向社会系统地说明自己的责

任与使命,表达图书馆人的职业信念,表明图书馆人的职业目标与立场^[54]。2007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启动“中国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与《图书馆服务宣言》研究”,研究成果是2008年公布的《图书馆服务宣言》。2015年,范并思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研究”完成。2006年以来,国内关于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的成果丰富,但是,关于图书馆核心价值还有许多尚待研究的课题。比如,图书馆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如何实现“无缝连接”,国际图书馆界主流价值观中哪些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哪些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去重新认识,图书馆核心价值如何在图书馆管理和业务工作中得到体现,这些都是图书馆基础理论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

(2) 图书馆职业精神

如果说前述“图书馆发展理论”中探讨的图书馆精神主要是讨论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一哲学层面问题的话,那么这里所论及的“职业精神”则主要讨论图书馆人对职业持有的信念和秉持的价值观,构成要素包括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责任、职业技能、职业纪律、职业良心、职业信誉等。图书馆职业精神,在内容上要鲜明地体现图书馆职业使命、职业责任和职业行为的精神要求;在表达形式上,要体现图书馆职业活动的特点,与图书馆职业活动的性质、任务、环境和条件相适应;在调节范围上,对内要能够凝聚人心,培育图书馆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职业观和价值观,对外则要为图书馆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让社会公众对图书馆职业有正确的认知。显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应该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

(3) 图书馆职业伦理

如果图书馆职业精神研究主要涉及信念、价值观等精神层面问题的话,那么图书馆职业伦理、职业道德则往往以守则、准则、规定等制度化的形式来规范图书馆员的职业行为。虽然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在概念及使用对象上有某些差异,但在功能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都是

将抽象的职业精神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条文,使之具有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作用。这种规范和约束,往往涉及许多法律难以干预的领域,因此职业伦理也是对图书馆法治的重要补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图书馆职业伦理准则类文件,中国图书馆学会于2002年公布了《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但关于图书馆职业伦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如德治和法治的关系,就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55]。如何将“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的思想贯穿于图书馆法治和图书馆职业伦理建设之中,是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

4 结语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图书馆学理论也是不断生长和发展的理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同样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中国和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还会以更加宏阔的视野,更加深邃的洞察力,不断吸收古今中外各种先进的科学理论和学术思想的精华,不断地融入能够反映时代和事业发展与变革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使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不仅能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而且能为国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 [1]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Huang Zongzhong.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1988.)
- [2] 梁启超.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J]. 中华图书馆协会报,1925(1):11-14. (Liang Qichao. Speech at the founding meeting of the Chinese Library Association [J]. Bulletin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1925 (1):11-14.)
- [3] 孙毓修. 名家著述:图书馆[J]. 教育杂志,1909,1(11):48. (Sun Yuxiu. Masterpieces of famous scholars: library[J]. Education Magazine, 1909,1(11):48.)
- [4]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16.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M]. Beijing: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14:116.)
- [5] 佚名. 本刊宗旨及范围[J]. 图书馆学季刊,1926,1(1):1. (Anonymous. The purpose and scope of this journal [J]. The Library Science Quarterly, 1926,1(1):1.)
- [6] 杨昭哲. 图书馆学(上)[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12-14. (Yang Zhaozhe. Library science(Part1)[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8:12-14.)
- [7] 李景新. 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J].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5,7(2):263-302. (Li Jingxin. Can library science become an independent science?[J]. Boone Library School Quarterly, 1935,7(2): 263-302.)
- [8] 史永元,张树华. 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4-11. (Shi Yongyuan, Zhang Shuhua. Selected papers on library science by Liu Guojun[M]. Beijing:Catalogs and Documentations Publishing House, 1983:4-11.)
- [9] 戴志骞. 论美国图书馆[G]//中国图书馆学会. 百年文萃 空谷余音[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27-30. (Dai Zhiqian. Discussing American library[G]//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Centennial academic achievements, empty valley echo endless[M]. Beijing:China City Press, 2005:27-30.)
- [10] 王子舟. 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24-29. (Wang Zizhou. Du Dingyou

- and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M]. Beijing:Beijing Library Press,2002;24-29.)
- [11] 吴慰慈,董焱.图书馆学概论[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Wu Weici,Dong Y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19.)
- [12]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M].北京:中华书局,1934;16.(Liu Guojun. Essentials of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Chung Wha Book Company,Limited,1934;16.)
- [13] 吴徐年.论“要素说”的形成与历史语境[J].山东图书馆学刊,2020(3):1-5,40.(Wu Tunian. On the forming and history context of “The Essential Factor”[J]. The Library Journal of Shandong,2020(3):1-5,40.)
- [14] 范并思.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四个时期[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8(1):24-34.(Fan Bingsi. Four periods of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2008(1):24-34.)
- [15] 王子舟,朱荀,蔡箴,等.衡旧如新立意高 遗篇一读想风标——纪念刘国钧先生《什么是图书馆学》发表50周年座谈[J].图书情报工作,2007(3):25-28,32.(Wang Zizhou,Zhu Xun,Cai Qing,et al. Discussion in commemo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issuing of *What is Library Science* by Liu Guojun[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07(3):25-28,32.)
- [16] 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学[J].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1):1-5.(Liu Guojun. What is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1957(1):1-5.)
- [17] 黄宗忠.试谈图书馆的藏与用[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2(2):91-98.(Huang Zongzhong. Try to discuss the collection and use of the library[J].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1962(2):91-98.)
- [18] 范并思.图书馆学理论道路的迷茫、艰辛与光荣——中国图书馆学暨《中国图书馆学报》六十年[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1):4-16.(Fan Bingsi. A review of the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7,43(1):4-16.)
- [19] 范并思.变革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任务[J].图书馆杂志,2000(9):2-4.(Fan Bingsi. The task of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period of reform[J]. Library Journal,2000(9):2-4.)
- [20] 李国新.对“图书馆自由”的理论思考[J].图书馆,2002(1):16-21.(Li Guoxin. A few opinions on the theory of the freedom of library[J]. Library,2002(1):16-21.)
- [21] 黎翔凤,梁运华.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472.(Li Xiangfeng,Liang Yunhua. Proofread and annotate the literature of Guan Zi[M].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Limited,2010;472.)
- [22] 孔安国,孙颖达.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264.(Kong Anguo,Sun Yingda. Annotation of Shangshu[M]. 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19;264.)
- [23] 刘华荣.儒家教化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2.(Liu Huarong. Research on confucian educational thought[M].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18;1-2.)
- [24] 龚蛟腾,方雯灿,易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重新审视[J].图书馆学研究,2018(15):2-8.(Gong Jiaoteng,Fang Wencan,Yi Ling. Re-examines of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science[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2018(15):2-8.)
- [25] 蒋永福,孙德政.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三题[J].图书馆建设,2018(4):112-116.(Jiang Yongfu,Sun Dezheng. Three ques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Development,2018(4):112-116.)
- [26] 谢金辉.党的理论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N].湖北日报,2017-08-27(007).(Xie Jinhui. The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ical social science discourse system[N]. Hubei Daily,2017-08-27(007).)
- [27] 李蓉.库恩科学哲学的社会学转向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1-94.(Li Rong. On sociological turn of Kuhn's philosophy of science[M]. 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8;91-94.)
- [28]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EB/OL].(2014-03-28)[2021-01-10].http://www.gov.cn/xinwen/2014-03/28/content_2648480.htm. (Speech by H. E. Xi Jinping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 China at UNESCO headquarters [EB/OL]. (2014-03-28) [2021-01-10]. http://www.gov.cn/xinwen/2014-03/28/content_2648480.htm.)
- [29] 黄宗忠.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再探讨[J]. 图书馆论坛, 2006(6): 3-10. (Huang Zongzhong. A restudy on the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Tribune, 2006(6): 3-10.)
- [30] 范并思. 新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转型——理论体系重构的初步设想[C]//构建面向图书馆职业的理论体系——第五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18. (Fan Bingsi. Transforma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new century: preliminary ideas for re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C]//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for the library professio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National Seminar on the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7: 18.)
- [31] 李振伦. 元理论与元哲学[J]. 河北学刊, 1996(6): 26-31. (Li Zhenlun. Meta-theory and meta-philosophy [J]. Hebei Academic Journal, 1996(6): 26-31.)
- [32]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M]. 第一版.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420. (China General Editorial Committee of Encyclopedias. Encyclopedia of China·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archival science[M]. 1st ed.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93: 420.)
- [33] 于良芝. 图书馆学导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17. (Yu Liangzhi.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3: 17.)
- [34] 黄宗忠. 对图书馆定义的再思考[J]. 图书馆学研究, 2003(3): 2-10. (Huang Zongzhong. Thinking again the definition of library[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2003(3): 2-10.)
- [35] 蒋永福. 不再追问本质: 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J]. 图书情报工作, 2010(1): 5-7, 90. (Jiang Yong-fu. No longer questioning the nature: the postmodern trend of the library science theory[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0(1): 5-7, 90.)
- [36] 刘君. 图书馆本质: “实存”还是“虚构”?——图书馆本质研究之一[J]. 图书馆杂志, 2012, 31(4): 2-6. (Liu Jun. The essence of library: “realism” or “nihilism”? Library's essence research series No. 1[J]. Library Journal, 2012, 31(4): 2-6.)
- [37] 荆宁宁, 程俊瑜. 数据、信息、知识与智慧[J]. 情报科学, 2005(12): 1786-1790. (Jing Ningning, Cheng Junyu. Data,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wisdom[J]. Information Science, 2005(12): 1786-1790.)
- [38] 吴建中, 程焕文, 科恩·戴安娜, 等. 开放 包容 共享: 新时代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榜样——芬兰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开馆专家访谈[J]. 图书馆杂志, 2019, 38(1): 4-12. (Wu Jianzhong, Cheng Huanwen, Koen D, et al. Open, inclusive and sharing: a new example of library space re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special interview with library building experts on the opening of the Helsinki Central Library, Finland[J]. Library Journal, 2019, 38(1): 4-12.)
- [39] 柯平, 弓克, 孙情情. 图书馆学概念衍进二百年之思考[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8(4): 2-6. (Ke Ping, Gong Ke, Sun Qingqing. The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200 years[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08(4): 2-6.)
- [40] 易凌, 龚蛟腾. 改革开放后中国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嬗变研究[J]. 图书馆, 2019(7): 6-14. (Yi Ling, Gong Jiaoteng. Research on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J]. Library, 2019(7): 6-14.)
- [41] 习近平.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EB/OL]. (2018-12-31) [2021-01-18].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8-12/31/c_1123923896.htm. (Xi Jinping.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s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s [EB/OL]. (2018-12-31) [2021-01-18].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8-12/31/c_1123923896.htm.)
- [42] 肖希明. 寻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21世纪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J]. 图书馆, 2004(1): 1-4. (Xiao Ximing. Seek the integration of tool reason and value reason: the dire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development in

- 21 century[J]. Library, 2004(1):1-4.)
- [43] 罗立琴,马恒通. 新中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60年[J]. 图书情报工作, 2011, 55(11):139-143. (Luo Liqin, Ma Hengtong. Review on the methodology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60 year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1, 55(11):139-143.)
- [44] 陈赞. 马克思关于人如何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探析[J]. 改革与开放, 2018(24):68-70. (Chen Yun. An analysis of Marx's thoughts on how to realize human's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J]. Reform & Opening, 2018(24):68-70.)
-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82. (Selection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2[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82.)
- [46] 王宇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问题研究[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45. (Wang Yufei. Research on the bas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M].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45.)
- [47] 李建华. 文化自信与中国伦理[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50. (Li Jianhua.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hinese ethics[M]. Changsh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8:50.)
- [48] 柯平,邹金汇. 后知识服务时代的图书馆转型[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9, 45(1):4-17. (Ke Ping, Zou Jinhui. Library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knowledge service er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9, 45(1):4-17.)
- [49] 卢泰宏. 图书馆的人文传统与情报科学的技术传统[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2(3):4-10, 17. (Lu Taihong.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of library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adi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2(3):4-10, 17.)
- [50] 程焕文. 实在的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精神的实在——《图书馆精神》自序[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6(4):2-14. (Cheng Huanwen. The realist library spirit and the library spirit realism[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06(4):2-14.)
- [51] 肖希明,石庆功. 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治理制度体系[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 46(5):4-21. (Xiao Ximing, Shi Qinggong. Constructing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public library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0, 46(5):4-21.)
- [52] 习近平.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EB/OL]. (2014-01-02)[2020-06-07].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102/c49169-24000494.html>. (Xi Jinping. Aligning our thinking with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EB/OL]. (2014-01-02)[2020-06-07].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102/c49169-24000494.html>.)
- [53] 蒋永福. 图书馆学通论[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9:256-302. (Jiang Yongfu. General theory to library science[M]. Harb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9:256-302.)
- [54] 范并思. 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我们面临的挑战[J]. 图书馆建设, 2007(6):15-18. (Fan Bingsi. On library core value: the challenge we must confront[J]. Library Development, 2007(6):15-18.)
- [55] 何鼎鼎. 让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EB/OL]. (2016-12-26)[2021-01-26].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1226/c1003-28975271.html>. (He Dingding. Let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complement each other[EB/OL]. (2016-12-26)[2021-01-26].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1226/c1003-28975271.html>.)

肖希明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沈 玲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收稿日期:2021-01-30;修回日期:2021-04-05)